

苦 斗

一代风流第二卷

西陽山



告 斗

一代风流第二卷

西阳山

广东人民出版社

苦斗

欧阳山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3.75印张 1 插页 806,000字

1982年12月第1版 1978年12月第4次印刷

印数156,101—498,100 册

书号 10111·577 定价 1.00 元

《三家巷》、《苦斗》再版前记

按照一九五七年的计划，我的长篇小说《一代风流》共分五卷，二百章。到一九六六年六月，共用了九年的时间，写完了一百四十章。后面的六十章，还没有写出初稿。已经出版的第一卷《三家巷》，四十章；第二卷《苦斗》，也是四十章；在《羊城晚报》发表过第三卷《柳暗花明》前五章。除这八十五章以外，已经写出来的其余五十五章，约莫相当于一卷半的分量，已经散失了。这笔账，是要算在“四人帮”身上的。

这八十五章发表之后，曾经在广大的读者当中引起了自由讨论。有赞成的，有反对的，都是对作者和作品的支持、爱护和关心，我表示衷心的感谢。我确实认为这种自由讨论是好的，是正常的，是值得庆幸的，也是理所当然的。这正好是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景象。由于我的生活基础薄弱，政治水平很低，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因此没有把这八十五章写好，使我深感内疚。但愿在将来的某一天把全书写完，然后来认认真真地进行一次总的修改。

不幸一九六六年二月，林彪和江青合伙炮制了一个什么《座谈纪要》，情况发生了突然的剧变。三年之后，即一九六九年六月，江青在一次会上，信口把我加封为“反鲁迅的胡风分

子”，到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四人帮”就用“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的名义，对我这个人和这本书在政治上做了死刑的宣判。当然，从“四人帮”的法西斯暴行看来，对我的宣判不过是无关轻重的小事，不过我倒觉得那份判决书的确是一篇饶有奇趣，不可多得的小品，应该替它“树碑立传”才好。何以见得？请看：

第一，它判决我“专写错误路线”，歪曲历史事实。江青的原话是这样的：“有些作品，歪曲历史事实，不表现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这是江青的话，也很象江青的话。妙极了。大家想一想，它到底说什么呢？按照我们普通人的脑筋想，把正确路线写成正确路线，把错误路线写成错误路线，这就符合历史事实。相反，把正确路线写成错误的，把错误路线写成正确的，才是歪曲历史事实。或者说，把井冈山会师写成林彪去和毛主席会师，那才是歪曲历史事实。是怎样的路线就写成怎样的路线，本来不存在“不表现”和“专写”的问题。那么，江青的用意到底是什么呢？如果说她替正确路线着急，那是冤枉了这位“老娘”的。她其实是在替错误路线着急。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文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我就是根据这种精神，做为背景，写了广州起义前的右倾和广州起义后的“左”倾的某些片断，并且通过某些对话来批评了这些错误路线。毛主席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也说过我们党当时受了欺骗，为什么周金就不能说？想不到江青为了她的政治目的，忽然跳出来压制批评，保护错误路线。但这话又不便明说，于是就创造了“专写错误路线”就是歪曲历史事实，错误路线有无倒可以不管的奇

妙逻辑。

第二，它判决这本书是搞“阶级调和、阶级合作、阶级投降”的。这就更加奇妙了。在它的行文当中，它也引用了毛主席在《共产党人》发刊词里面的一些话，按说它的作者们是知道毛主席关于和资产阶级有联合也有斗争的思想的。那么，怎么能够把广州起义和震南村的斗争，把何家对农民的压迫和陈家对周家的陷害，以及周家、胡家对各种横暴势力的抗争，都看成是阶级调和呢？单从陈、周两家的关系来说，陈家是要吞掉、俘虏或“溶化”周家的，其中陈文婕还真正幻想过“劳资合作”，但是大家都看见的，陈文英对周炳的诱惑失败了，陈文雄和周炳闹翻了，陈文娣和周榕破裂了，陈文婕的试验农场垮台了，陈文婷也和周炳分离了，这还只是在故事前期发生的事情，以后的发展姑置不论，就看这些也不象个“调和”的局面吧？

不过“四人帮”的妙用肯定不在于此。如果按“四人帮”的本性来说，他们本来是会象陈家一样，对工人阶级采取吞掉、俘虏和“溶化”的政策的。那么，是不是怕这本书继续发表下去，陈家的政策着着失败，阶级斗争愈演愈烈，以致妨碍了“四人帮”的大业，因而匆匆忙忙出来把这本书查禁了呢？

后来我再三玩味，才恍然大悟。原来我把周炳写成了一个“民主派”了，如果让他经过更多的阶级斗争的锻炼，他也可能成为一个“老干部”即“四人帮”所谓的“走资派”，那还了得？“四人帮”使用了全身解数，把调和、合作、投降这一大堆帽子，劈头盖脸地扔过来，那奥秘大概就在这里了。

第三，它判决周炳是“投机分子、叛徒和工贼”。并且发誓说我是把叛徒和工贼当做理想的英雄来歌颂的。当然，“四人帮”毫无根据地拿这种罪名陷害别人，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陈

词滥调，没有什么新闻价值了。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也有缺点的。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

我就是根据这种精神，选定了经过几十年的观察、体验、研究、分析得来的人物周炳做我的主角。我以为他比较典型，比较有普遍性，并且比较有教育意义。他是一个手工业工人出身的知识分子，在这八十五章里面还不是党员，他参加革命是出于一种个人的反抗，他有许多资产阶级思想，也做了一些错事，他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有些亲戚、邻居、同学的关系，但是他要继续革命。

作者既没有把他当做英雄，更没有把他当做理想，既谈不到歌颂，有时还有些非议，但作者是同意他继续革命，把整个改造过程走完的。我以自己之心，测“四人帮”这些大人物之腹，私下认为他们之所以不许他革命，无非想证明他们自己是天生英雄，纯洁好汉，革命圣人，真命天子，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第四，它判决了作者是“反鲁迅的胡风分子”和三反分子。并且简直到了“铁证如山，赖得掉吗”的地步。其实这并不足怪，也没有多少申辩的价值。因为这是江青的圣谕，它不过奉旨宣示而已。而江青给人定罪，总是按照“朕即国家”的习惯，不必说出理由的。况且经她定罪的人，又何止成千成万？都要说出理由，也太麻烦了。要说江青和“四人帮”专横暴虐，阴险

毒辣，卑鄙龌龊，愚昧无耻，那也超不出法西斯本性的范围，早就是家喻户晓的，也值不得多谈了。

不过有一点，倒是值得提一提的，就是判决书中对我还有些客气的地方：江青明指我是“胡风分子”，它却没有明指，只说“是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中一支乔装着革命面目的别动队”。这象是一种外交词令，意即文化特务，其实还是“胡风分子”。但是提到“别动队”，我倒又想起了一九三四年公开发表的姚蓬子的叛变宣言，他也咒骂中国共产党“完全成了帝国主义的别动队”。妙哉，妙哉！怎么都那么喜欢“别动队”？这中间到底有些什么联系，只好等将来的历史学家去考证了。

我今年已经七十岁，虽然不算稀奇，但血压已经高了，脑动脉已经硬化了，两眼也有了白内障，不可避免地“发苍苍，视茫茫”起来。要不是“四人帮”非法剥夺了我十年工作时间，我肯定能把《一代风流》这本书写完的，如今我不能不怀疑自己是否有足够的体力来做完这件事，甚至我原来曾经估量过自己已经没有完成这个工作的力量了。我知道，倘若我完不成这个工作，不免会有一些关心爱护的读者觉着惋惜和遗憾。

感谢英明领袖华主席，带领咱们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挽救了民族，也挽救了文学艺术。最近，华主席又向咱们提出了新时期的总任务。我也和全国人民一道，感到精神振奋，心情舒畅；同时，我个人私下也想跟“四人帮”赌一赌气；所以我现在下决心写下去，对剩下的一百一十五章做不自量力的尝试。这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成败利钝，我现在都置之度外了。

作 者

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在广州。

目 录

四一	幻想	403
四二	翻生区桃	414
四三	一线天	423
四四	险地	435
四五	咫尺天涯	446
四六	过五关	458
四七	博爱与和平	468
四八	沉沦	478
四九	余庆坊快事	489
五〇	不如归去	499
五一	寂寞的冬天	510
五二	旧地重游	521
五三	十大寇	534
五四	第一赤卫队	544
五五	跋涉	555
五六	一个谜	566

五七	喜相逢	576
五八	诀别	588
五九	恍如隔世	599
六〇	后继和前仆	610
六一	反脸无情	621
六二	七月的奇遇	633
六三	西水图	643
六四	鬼地脚	652
六五	请命	662
六六	善有善报	672
六七	三灾	682
六八	南渡口的风波	693
六九	踢蛇窦	703
七〇	有缘千里	714
七一	有人快活有人愁	725
七二	凯旋	737
七三	佳期	746
七四	大展鸿图	755
七五	真伪之间	766
七六	女英雄	777
七七	擢甲里二百号	786
七八	小纠察队员	797
七九	终天恨	808
八〇	鸟惊心	821

四一 幻 想

在一个昏暗无光的早上，周炳所坐的轮船从吴淞口慢慢驶进上海的黄浦江。迷蒙烟雾，苦雨凄风。两岸的码头、工厂、货仓，谦逊地向他鞠躬，悄悄地向后退走。几天来吵闹不休的轮船，这会儿肃静无声地滑行着，好象在油面上行走的一般。汽笛一声长鸣，好象为他鸣锣开道。黄浦滩上那些雄伟高大的建筑物，都你挤我、我挤你，恭恭敬敬地站立着，仿佛在欢迎一位伟大的人物的光临。周炳迎着风雨，也没有戴帽子，毫无畏惧地站在甲板上，象恐吓淘气的孩子似地对上海说道：

“你好生当心着！叫我给点厉害你瞧瞧！”

这时候，他十分相信自己是一个有力量的人。他还相信他的遭遇一定会十分顺利，他所要找的那些朋友，差不多一上码头就会碰见。这样，他马上就可以在上海轰轰烈烈地大搞一场，正象在广州不久前才搞过的一样，好歹凭着他个人的力量做出一番事业来。但是他的幻想还没有完场，却叫一种东西把他的身体给冲击了一下，冲断了。他定神一看，原来有个穿白制服的外国人十分粗暴地用手推他、撞他。那家伙嘴里发出不干不净的声音，看样子十分野蛮，又正在生气。那种毫无礼貌的神气，不单不象对待一个尊贵的人，而且不象对待一个仆

役。周炳没有直接接触过外国人，这还是头一回。他气得涨红了脸，举起拳头，正要揍过去，旁边一个中国人赶快把他的手拽住了。就这样，一个外国人就把他们四、五个中国人象赶鸭子似地推下统仓去。……

不久，船就靠了码头。码头上全是湿漉漉的，又显得杂乱无章。周炳提了铺盖卷，象钻狗洞似地钻上了码头，才想起自己人生路不熟，不知道怎么走法。他掏出地址看了又看，只见那上面写着“宝山路金鑫里三号张公馆”，却不知道这金鑫里到底座落何方。想问问人，可是不懂话。又瞧着四下的人全象在那里吵架似地说着话，自己也不好插嘴。正在团团转、没主意的时候，忽然背后有人叫了一声，“表舅！”他回身一看，正是他大表姐陈文英从广东带出来的使妈阿云，特地来接他的。这阿云是顺德人，年纪三十左右，矮小结实，头上梳着辫子，身穿方格呢子大襟衫裤，披着一条又宽又长的墨绿毛线围巾，满脸笑容地要伸手接过他的铺盖卷。周炳在广州就认识她的，哪里肯叫她提行李，只顾问她大表姐怎样，表姐夫怎样，孩子们又怎样，一面跟着她走出码头。阿云讲了许多情形，末了，狡猾地斜眼望着他道：

“表舅你来得正好。这阵子，老爷和太太两边都有点不悦意的样子，也不知他们心里搁着什么事儿。得你来调停调停，正好。”周炳听着点点头，没多问。不大一会儿工夫，他们两部黄包车就到了金鑫里三号后门口。张子豪这时候正当着上海市闸北区的区长，上衙门去没回来。大表姐陈文英带着张纪文、张纪贞两个孩子，一个九岁，一个七岁，在厨房门口迎接他。周炳看见陈文英还是那样高高瘦瘦的身材，尖尖长长的脸儿，小巧巧的鼻子和嘴巴，只是眼睛稍为圆了一点儿，大了一点

儿。一见她，周炳就想起自己的姐姐周泉，不过她比周泉更瘦弱些，更苍老些，皮肤更白净些。当下他就说：“大表姐，日子过得好！大姨爹、大姨妈、表哥、表姐、我爸爸、妈妈、姐姐都问你好！”陈文英看见周炳还是那样圆头大眼，阔嘴宽唇，胸厚肩宽，手粗脚长，走起路来，踩得地板吱吱叫，震得杯盘叮叮响，只是在那孩子气的嘴唇上，隐隐约约有点胡须影儿，就笑咪咪地说道：“还是那么爸爸、妈妈、哥哥、姐姐的呢，简直那么大不透的呢！简直那么大不透的呢！”跟着又说，“这回省城打仗，你们都受惊了吧？”后来又说，“爸爸、妈妈年纪都大了，就是舍不得广东！上海多么太平，吃、喝、玩、乐哪样缺，就是不肯来，宁愿躲在老窝里担惊受怕！唉，广东人就是这样的啦，南洋、金山，再远都不怕，一提到北方，死都不去！”随后，她就给周炳张罗房间，叫用人们找这找那，再不去注意周炳是否有什么话要说。安顿好，她就另有约会，打扮得雍容华贵地出门去了。午饭，还是使妈阿云给他端上房间里来，让他一个人独自吃。

这样子，周炳算是在上海找到了一个暂时的栖身之所。开头一个星期里面，他除了饭后出去散散步之外，差不多简直没出过门口。他给家里，姐姐周泉，表姐陈文娣、陈文婕，三姨爹区华，舅舅杨志朴，都去了信。还特别给哥哥周榕写了一封长信，托区华给他转去。西门的王通、马明一伙，南关的陶华、丘照、邵煜、马有、关杰一伙，沙面的章虾、黄群、古滔、洪伟一伙，河南的洗鉴、冯斗、谭桢一伙，又都各自走散，虽然心中想念，都没法通个消息。信一写完，他就无事可做，闷得发慌。他那两个学生张纪文、张纪贞，开头看见来了个家庭教师，都欢天喜地来上学，可是第三天，张纪文就不来

了，第四天，连张纪贞也不来了。大表姐陈文英说，“孩子小，喜欢念就多念一点，不喜欢就少念一点吧。”周炳听说这样，也只好随他去，来一天、不来一天地念着。闲着没事，他就去看报纸。看了《申报》，就看《新闻报》；看了《新闻报》，就看《时报》、《时事新报》。从第一版的药品广告一直看到最末一行的小信箱、寻人启事、征求朋友之类的东西，把那些大人物纷争，小人物纠葛，奸、淫、掳、掠，偷、讹、拐、骗，失业、罢工，迷信、横祸，水火、灾害，官司、人命，一件件地往肚子里装。装完了之后，就长叹一声道：

“哦，这就是上海！”

看完报，他就来研究他所住的这幢房子和这幢房子里面的人。房子很大，很华贵，清清静静，阴森森，要不是张纪文和张纪贞偶然哭闹吵嘴，简直静得好象没人居住的一般。大门朝南临街，整天关着不用。大门之内，是一个大天井。过了天井，是一个大厅。大厅两旁，是东西厢房，东厢房做会客用，西厢房做孩子们的书房。大厅之后，还有饭厅，再后面就是厨房，下房。后门朝北开着，一家人平常出入，都走这里。二层楼上，前楼是张子豪的书房，后楼是孩子们的卧室，东厢房和西厢房是张子豪和陈文英的卧室。三层楼上，前楼空着，摆了几件简单的家具。后面是一个大晒台。东厢房也空着，堆放一些不等用的东西，西厢房就做了周炳的书房兼卧室。整整一个星期，周炳才看见张子豪一回，陪着周炳吃了一顿饭，象个大人物一样，问了几句不相干的话，说了几句共产党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国民革命已经成功之类的言语，便坐着汽车，带上卫士走了。他走了之后，这幢大房子就剩下陈文英和张纪文、张纪贞和今年才一岁多的张纪庆三个孩子，此外就是阿云、阿

秀两个广东使妈，张纪庆的江北奶娘江妈，和一个专做粗重的浦东大姐春兰，再加上新来的家庭教师周炳，一共大小只有九个人，真是寂寂寥寥，空空荡荡。起初，周炳以为陈文英和张子豪有什么反目不和之处，但是看样子倒还恭恭敬敬，热热呵呵的。只是表姐夫老说有公事，赖在外面不回家；大表姐整天也和一班男女教友厮混，不是聚会，就是听讲，再就是跑跑孤儿院、济良所、盲哑学校、慈善医院之类的地方，搞搞募捐、救济、舍药、施粥之类的事情，两家各行其道，互不相干。周炳向阿云、阿秀、江妈、春兰打听，也打听不出所以然来。他自己寻思，大概有钱人家，就是这样子生活的，还是自己寻找革命朋友要紧，也就不去理会了。

一个星期过去，两个星期过去，已经到了一千九百二十八年一月初旬了，广东那方面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这边主人虽然还没有什么，那些广东使妈、奶娘、大姐，却逐渐怠慢起来。那些少爷、小姐，不只不尊重先生，反而把先生捉弄、嘲讽、辱骂、殴打，十分不象样子。周炳不由得心里暗暗着急起来。……他有心亲身出去寻找，可是上海那么大，从哪里下手呢？再说上海也不比广东，冬天是很冷的，他连冬衣也没有，确是出去不得。陈文英好象看出这种情形，就把张子豪一套旧的藏青哔叽学生装，一件厚毛线衣，一件旧大衣亲自给他送来了。看见他穿得整整齐齐，准备出门了，就笑着说道：“看我糊涂不糊涂，差点儿把什么大事都给忘了，冻坏了咱们的落难书生！”自从那天以后，周炳又给广东方面去了六、七封信。寄完信就在马路、弄堂，大街、小巷，到处乱转，从大公司、大洋行到小纸烟店、广东杂货铺，都看了个饱。他看见一切荣华富贵，也看了更多的痛苦、虚伪、屈辱和罪恶。他把这一切

都写在信里，告诉广东的亲友，但是三个星期都过去了，却得不到随便哪一个的一点回音。尽管他天天在街上瞎跑，却也从来没碰见过一个相识的人。这样，他慢慢失望了。从表面看，好象上海没有什么人在闹革命。即使有人在闹革命吧，好象也不怎么需要他，不见得有什么非他不可的样子。有一次，他无意中撞进了“外滩公园”，叫印度巡捕举起棍子吆喝着把他撵了出来。那棍子只差一点儿没有打着他的脑袋。他退出门口一看，原来那小铜牌子早就端端正正，明明白白地写着：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这件事给了周炳的自尊心很大的打击。周炳自己对自己问：“你还象一个广东人么？”又自己回答自己道：“哼，我就说你不象一个广东人！”事实明摆着：上海不仅不需要他，并且对他也不总是那么客气，那么谦逊。他从失望变成冷漠，从冷漠变成害怕，从害怕变成厌恶，从厌恶变成烦闷，从烦闷变成伤感。他开始读郁达夫的书，读郭沫若的书，读鲁迅的书，也读许多唯物论入门，辩证法发凡，唯物史观浅释，苏俄游记一类的书。

看看到了阳历一月下旬，阴历除夕那一天，陈文英做了一桌家乡风味的团年饭，请周炳一道团年。陈文英嫌饭厅太冷，叫把酒菜端到楼上书房来吃。桌面上菜式很多，只是座席上才得陈文英、周炳、张纪文、张纪贞四个人。周炳说，“怎么今天星期天，又是团年，表姐夫都不回家团聚呀？”陈文英听说，眼圈红了一红道：“刚才有电话来，说今晚有要紧公事，不回来了。——别管他，咱们吃咱们的吧！”周炳听了，不便多问。只见陈文英左一杯，右一杯，不停地把那瓶蛤蚧酒往肚子里灌，不久就陶陶然，两颊绯红，话头也多起来了。张纪文两兄妹胡

乱吃了一会儿，就摔下筷子，跑到楼下放炮仗去。书房里，煤炉生得很旺。窗外虽然刮着凛冽的寒风，里面却暖和得跟春天一样。陈文英又劝周炳喝了几杯酒。在那雪亮的电灯光下，她摇晃着那细长的身影，自己也陪着干了几杯，就乘着酒兴说道：

“省城这一场大乱，我想你一定是有份儿的了，没想到你却没份儿！天下事真有意料不到的呢。论脾气，论经历，你不会不是个红党，可你不是。没份儿也好。要不然，恐怕你就没福份到得这上海来呢。只怕连脑袋瓜子都保不住呢！”

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周炳这时候从陈文英的脸上看出一种狡诈和试探的神气。他一时难以决断，究竟对她说真话好，还是不说真话好，嘴里唔唔、呀呀地应付着，脸上和手上就露出那局促不安的窘样子来。没想到那局促不安的窘样子，却使陈文英大为快活。她嘻、嘻、嘻地笑了一阵，又说：

“怎么样，表台，上海这地方，住得还称心如意么？人家说，上海的地方是中国最好的地方，上海的人是中国最漂亮的人，上海的洋货是中国最上等的洋货。这句话是真还是假？”

周炳把搭拉着的脑袋仰起来，神气开朗地笑道：“你要我说假话，还是要我说真话？”

陈文英虽然是三十岁的人，这时候却年轻得只跟二十岁的一般，把两只原来就很大的眼睛睁得圆圆地说：“说假话又怎样，说真话又怎样，你都说说看！”

周炳用筷子夹了一块蚝豉吃了，说：“如果说假话，我就说，上海真是一个荣华富贵的地方。洋房多。汽车多。电灯也多。还有电车和煤气，打电话用不着接线生，吃水用不着挖井。人活在这里，好象神仙活在天上一样。”

陈文英不住地点着头，问道：“如果说真话呢？”